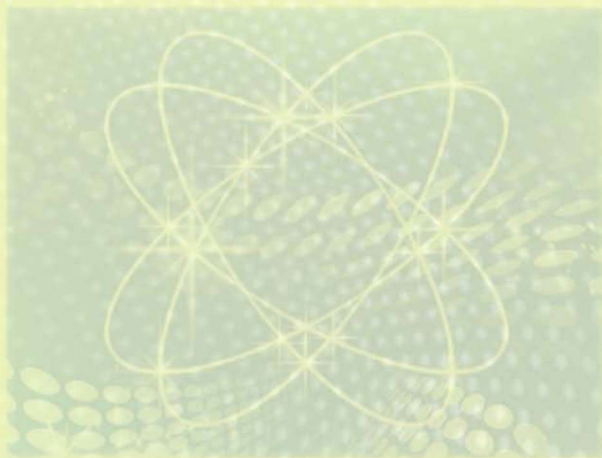


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

倪乐雄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海洋强国出版工程

周边国家 海权战略态势研究

倪乐雄 主编



内容提要

本书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韩国 7 个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与海权战略作初步探讨,形成一系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 / 倪乐雄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313 - 12593 - 4

I. ①周… II. ①倪… III. ①制海权—海洋战略—研
究报告—世界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17 号

周边国家海权战略态势研究

主 编: 倪乐雄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21 - 64071208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2593 - 4/E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 - 68180638

序 言

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相对而言,海洋文明是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经常地扮演着历史火车头的角色。因为海外贸易与强大海权支撑的基本社会结构,保证着这种开放性社会与外部异质文明世界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和互动,不断刺激着社会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从而形成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肥沃土壤。于是,我们看到,在海外贸易和强大海权搭建的平台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以及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繁荣。如雅典的海权之于数学、几何学、医学、哲学、悲剧艺术、人体雕塑、奥林匹克运动和以帕特农神庙为代表的建筑艺术;威尼斯的海权之于手工作坊的兴盛和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海权之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小说创作和浪漫主义诗歌;美国的海权之于诺贝尔奖、航天技术乃至好莱坞电影等等。到 21 世纪的今天,海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关注。

一、海洋战略与海权战略的区别

近年来在讨论中国海洋发展问题时,海洋战略与海权战略两个概念时有混淆、互为指代,故而在展开讨论前,先给予辨析

澄清。海底石油、天然气、海洋渔业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产业行为,由于学界近些年来对“战略”一词有着特殊的偏爱、也许传统尚武精神转移到了中国学者群,导致“战略”一词被普遍地滥用,以致开个酒店、规划一个旅游景点都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笔者看来,时下流行的海洋战略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仅指产业和企业的开发计划,只是冠以军事术语而已。

严格地说来,只有国防军事领域的规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滥用“战略”一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国家层面的海洋战略与军事层面的海权战略经常性地混为一谈,因此笔者首先大致界定:海洋战略是一个濒海国家对海洋利益宏观的规划,包括经济、外交、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是对这几个方面的统筹考虑和计划。海权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军事上执行海洋利益方面既定的经济、外交和政治方针。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主要在军事方面,以及军事层面的海权战略与国家层面的海洋战略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近现代“海防”问题的由来

近代以来,中国的海权战略以“海防”的形式出现,其不变的核心内容是防止外部从海上入侵本土,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依赖耕地而生存,自产自足无需依赖本土以外而生存。相反,外来的商业贸易并非必需,而且商业利润最大化倾向无论在思想观念上和现实生活中都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社会秩序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因而中国古代政府一向对商业采取指令性管理,以控制其规模,古代海军(水师)在平时兼有稽查海外走私的功能,虽然表面上是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实际执行的是控制社会内部的职能。

近代典型的西方海洋国家如荷兰、英国的生存基础与中国农耕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们的生存依赖海洋贸易,“外向

型经济”是其国家主要经济形态。海洋国家的生存依赖本土和本土之外某地区构成稳定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一旦这种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国家生存便受到严重威胁。

于是,海洋国家的国防任务就是保卫本土与海外地区建立的经济结构,包括本土连接海外的“海上生命线”,海军军种不仅构成国防力量的主要成分,而且根本上是国家生存的成本投入,如同陆军军种是内陆农耕社会生存的成本投入一样。这就决定了海洋国家的国防范围必然越出本土,军事力量必须保障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和投送到关系本土生存的海外重大利益区域。海洋国家这种超越本土的“远距离防御”在外部世界看来,尤其是非海洋国家看来是为经济利益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扩张服务的军事侵略。

17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向东方的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为近现代殖民主义的持续侵略扩张。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家,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产生对西方国家的天然抵制。因此,在明末清初开始,当长期威胁中原地带的北方草原地带传统入侵威胁解除后,中国的军事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海防问题——防止来自海上的入侵,并且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根本上讲,这种海上威胁来自西方向亚洲持续了数百年的殖民主义运动。

三、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和“海上生命线”的出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海权战略继承了明代“倭寇”以来的海防核心观念,即防止来自海上的外部军事入侵。从明代戚继光、俞大猷防范“倭寇”,到晚清“洋务运动”建立水师,再到民国期间的海军建设,海防观念可谓“一以贯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发出号召:“为了反对帝

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二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实施经济封锁,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上采取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因而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初步建立了本土自成体系的、不依赖国际社会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化体系。所以,国家工业化已初具规模,但经济形态方面还是继承了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内向型经济”传统,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原料还是产品,基本都在本土获取和消费,并不依赖海外市场。

因为是独立自主的“内向型经济”,便没有西方海洋国家在“外向型经济”的动力下发展远洋海军的强烈需要,捍卫本土的工农业生产体系是国防的主要考虑。海陆空三军的国防任务就是防止外部敌人从天空、海上、地面对本土的侵略和破坏。这样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国防在维护“内向型经济”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国防传统,也就是几千年一以贯之的“陆权主义”传统。体现在海权方面,海岸线水域的防御只是陆上防御向海洋伸出的触角。海军战略部署是“近岸防御”和“近海防御”,与古代海军传统大致无二。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迅速转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经济建设轨道。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我们在同世界交往、学习、模仿和赶超中,国家经济基本上融入世界体系,生产原料和产品市场以及能源都严重依赖进出口,“内向型经济”已转型为史无前例的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我们的经济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变成类似古代雅典、迦太基,中世纪威尼斯和近现代荷兰、英国等的经济生存方式,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海上生命线”的问题,以及关乎本土生死存亡的海外重大利益区域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不知不觉

由传统农耕国家变成了现代海洋国家。

四、中国的国防和海权战略的转型

欧洲文明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海权发生的规律：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生存状态一旦出现，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在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文化笼罩的世界里，炮弹跟着金钱走，舰队跟着商船走。在霍布斯文化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当中国的经济生存形态转型为“外向型经济结构”时，中国的海权战略面临两个挑战：一是传统的“防止海上入侵”的能力在常规战争层面尚没有完全具备（目前本土不被军事入侵根本上依赖核武器威慑）；二是新出现的“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保护问题。而以往的海军战略“近岸防御”和“近海防御”则远远不能满足第二项任务的需要，被迫将转向“远洋防御”。

此外，就整个国防性质而言，国防第一任务就是捍卫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历史上所有的海洋国家一样，中国国防的范围有史以来第一次越出了本土，覆盖本土之外的“国家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这种由国家经济生存方式巨变带来的国防转型不仅要求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而且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还将需要与“远洋防御”相匹配的其他军、兵种。

当前以东海钓鱼岛、南海的南沙群岛为焦点的领海主权争端，让传统领海主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中国海权战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我国传统主权海域的保护，也包括遏制“台独”，并保障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内的各种资源开发安全。虽然，这些争端导致同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的紧张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当前引人注目的传统海疆争端并非中国海权战略的主要隐患，主要的长远隐患是危及国家生存的“海上生命线”和涉及国家稳定的“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安全。在“国家海上生命线”上潜伏着来自美国、日本、印度的军事威胁。

五、康德文化和霍布斯文化并存状态下的海权困境

从最经济最理想的角度而论,海洋国家的“海上生命线”最可靠的保障是世界进入康德永久和平的体系,以此为目标,当今国际社会体系中的各主要大国应自觉地抛弃与之目标相悖的各种“私利”,担负起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秩序的责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大国自身的海权保障应建立在世界永久和平的建设上,而不是依赖于传统的军备竞赛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然而,诚如霍布斯所说:“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所谓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推至国际社会,由于联合国不具有世界政府的权威,目前乃至长远而论,国际社会仍将处于无政府状态,联合国协调机制相当得有限,某些大国一旦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甚至绕开联合国一意孤行,如美国推翻萨达姆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因此,霍布斯的观点也可表述为:自然状态下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也是战争关系。在国与国之间,和平手段用尽后诉诸武力的现象还将持续下去。因此,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不具备超越本土的“远洋防御”能力,将来恐有灭顶之灾。用康德永久和平的观念来指导霍布斯时代的行动,我们将犯时代性错误。

当我们按照传统的海洋国家途径来制定海军战略时,我们会发现很快陷入困境,因为这将引起周围国家和当今强国的不安,它们也将加强自己的海军建设,甚至联手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就有明显的组织海上军事同盟以遏制中国的趋势。所以按传统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不顾一切地发展海军,既有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竞赛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因周边国家或潜在对手同步增长,海军力量同原先比没发生多少变化,而维持军力的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与此同时,按照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走下去,将与我们“和平崛起”的愿望渐行渐远,

而离全方位冲突越来越近。于是,我们陷入了两难困境。

面对世界这种现状和前景,面对两难的困境,中国海权战略应有两手准备,在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同时,也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应付未来可能的不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在建设符合我们需要的海军力量时,又不会引起他国的不安全感。中国未来的海军既要做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来临的准备,又要作好应对霍布斯弱肉强食卷土重来。

六、“和平崛起”走向决定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中国正在崛起,至少在当下和愿望上向世界真诚地表达着和平崛起的愿望,中国深刻地反思着历史上,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显然地想竭力避免自己的崛起成为新一轮的世界大动荡。然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内部环境,由于几千年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权力结构 and 经济结构始终在平等和公平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如果社会转型将这种致命的缺陷继承并固化为现代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社会将在这种结构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耗中,止步不前,即便是勉强地挣扎着崛起,从内部来讲就不是“和平崛起”。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国家是带着剧烈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崛起的,宛如一个火药桶,随时引爆崩溃,如隋炀帝的帝国就属此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与公正。外交是内政自然和逻辑的延续,由己及人,由内及外,一个内部缺乏平等和公正、不和谐的国家是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的。

当中国克服千年传统带来的文化、制度的痼疾,成为一个内部比较和谐的社会后,是否能够和平崛起?这也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取决于历史经验和传统惯性对人们的暗示强度。

以往海权大国崛起无一不是通过武力,这一切成为某些外国想象中国未来崛起的内容,而中国建立必要的远洋防御性质的海军,似乎让历史经验的暗示同未来内容的想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

面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和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中国竭力以行动证明自己不走传统大国的老路,最终以真诚赢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具有和平诚意的中国与信任中国的外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和平崛起。二是中国尽最大诚意和努力之后仍然无法赢得外部的信任,被迫与外部进行敌对互动,被迫放弃和平崛起而按传统海权大国方式行事。显然,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至少一半尚需外部的配合。这两种可能性对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将产生截然相反结果,也会对亚太和全球产生截然相反的深远影响。

特别强调一下,外部世界的疑虑,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疑虑,是几百年来东西文明交往中,由“炮弹跟着金钱走”、“军事跟着贸易走”的西方“师傅”带出了自己的东方“徒弟”后,以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来揣摩、想象东方“徒弟”的未来作为,并因此而产生了焦虑和遏制的念头。

七、高端科学技术赐予中国海权发展的机遇

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地理位置和特征看,中国中西部处于亚洲内陆、东南濒于海洋,属于陆海兼备的复合型国家,海权和陆权应并举。事实上,一个国家海权和陆权的属性并非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东南诸省濒临大海,有着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但几千年来并没有成为海权国家,而属于内陆农耕性质的内陆国家。日本国由海上一连串大小岛构成,但在明治维新前,并没有像古希腊城邦国家那样成为海权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内和中国一样,属于封闭型的农耕社会和崇尚陆权国家。可见,地理位置在决定国家海权还是陆权属性方面固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西方文明的历史表明:“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才是滨海国家成为海权国家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海军持久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曾不乏强大的海军(水师),但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近代“洋务运动”打造的北洋海军,仅仅是为了抵御来自海洋方面的军事入侵,而非出自国家长久的生存需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国家迅速转型成“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现代海洋国家,虽有“海上生命线”之虑,但却获得海军发展的持久动力源。

中国海权发展的另一个机遇是军事高科技发展到精确制导的时代。当年法国大革命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然而,法国东面要对付陆上强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西面要对付海上强权英国,来自陆地和海上的威胁迫使法国同时要具备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而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不能做到“海陆互借”,海军强大并非意味着陆军强大,陆军强大也不意味着海军强大。法国资源有限,不足以同时应付海陆两方面的压力,拿破仑又不自量力地两个拳头同时向海陆出击,结果在七次同反法联盟的战争中遭受巨创,沦为二流国家。

近现代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酷似法国,一方面要对付来自日本的海上强权,另一方面要对付来自俄罗斯的陆上强权,国力则无法应付,因而有晚清王文韶“塞防”、李鸿章“海防”和左宗棠“塞防海防兼顾”之争议。不仅反映了当时财政上捉襟见肘,也反映当时海军装备与陆军装备无法“兼容”。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和作

战手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接近于陆海空军兵种的“相互兼容”。常规作战制空权决定一切,制信息权又决定着制空权,陆海空战场均以精确制导的导弹攻击为主要作战手段。精确制导武器系统不仅决定大气层外航天对抗和大气层制空权对抗的胜负,也决定陆战和海战的胜利。陆、海、空三军种高端武器作战系统和作战样式已经高度兼容,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国防的成本,摆脱上两个世纪因地理位置原因海陆不能兼顾的窘境。这是今天的科学技术赐予我们的良机,也是赐予中国海权发展的机遇。

八、中国海权战略的现实应对——威慑姿态

从美国 2012 年夏天高调介入南海,日本、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发生的海疆争端来看,这些国家仍然受传统“合纵”型战略思维支配,本质上是霍布斯原则指导下的战略行为。因此,中国必须暂时放下理想主义,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之。

目前东海、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中国崛起的身份与传统海疆主权长期被侵占的现实严重不相称,中国要恢复对传统海疆行使主权,驱逐侵占国。由于长期对海疆被侵占反应软弱,这些年迅速变得强硬起来后,却被外部世界认为是中国海上扩张的不祥之兆。这种冲突比较尖锐,历史上国家崛起的标志是:不是你的东西成为你的东西,哪有崛起的国家任凭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任蕞尔小邦肆意蚕食? 历史经验的暗示和“海上生命线”、“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现实焦虑已经使得中国产生“远洋防御”的强烈冲动,而本土传统的主权海域却在被蚕食,这种现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海权战略上不能接受的一种势态。要使远方的路畅通,岂能不搬掉家门口的绊脚石?

也许,当今海权强国美国才是中国海权战略真正的对手,这点是心照不宣的。由于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和对未来的猜疑,必

然带出军事上的防范和海权战略的碰撞。中美海权战略冲突的实质是：中国发展合理的、必要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合理、必要的远洋海军同美国要保持以往海军绝对优势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即便不是你死我活也是难以调和的，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双方时缓时紧的军备竞赛。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交战代价与实际利益收获太悬殊，因而真正发生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大，而往往以持续的可评估的威慑相对峙，并以这种可评估的海上威慑来影响双方的利益调整。比如希拉里在2010年5月以切断中国海上能源供应线向中国发出警告。

尽管建立强大远洋海军，很大程度上倒不是用于作战的，更多是发挥实际的威慑作用，以便捍卫国家海上利益和震慑潜在对手及其周边觊觎者，所以，我们不能吝啬军费开支，维持强大海军的经费一定远远少于因国防不强而被迫进行的战争消耗。

九、当前中国海权威慑方向及战略任务

如果周边国家以霍布斯丛林原则与中国打交道，那么，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南海的地缘政治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生死存亡，而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问题。如果我们丧失了南海，经济上将损失巨量的海底石油、天然气和海洋渔业等资源。在交通方面，南海作为我国“海上生命线”可控部分亦将失去。在军事方面，我国将失去广阔的国防战略纵深，国防线将被压缩至海南岛一线。从亚太海域战略形势而论，一旦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海军联手，中国海上南大门将被关死。从军事斗争着想，未来的形势不容乐观。

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上述弱点将在与外部敌对势力冲突时被对手充分利用，而且已经在外交方面不止一次地被对手作为压制我们的筹码。未来主要的威慑方向是在南海，强大的海军不仅要保卫传统的南中国海域，还要随时驶入印度

洋以遏制对我国“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各种威胁。在黄海和东海,海军除继续执行在海上拱卫京畿重地和警戒台海外,北海舰队还兼有协助东海舰队的功能,东海舰队除了北上协防配合北海舰队外,还有南下协助、增援南海舰队的职能,当南海舰队全部进入印度洋执行作战任务时,东海舰队具有填补南海舰队原防区的能力。此外,三大舰队还需具有临时抽调、混合编组执行远洋作战任务的能力。

我们要预防出现最严峻的外部形势。美、日、印、澳加上东南亚愿意依附的越南、菲律宾等小国形成海上军事联盟,一旦形成这种战略对峙的态势,除了动用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分化瓦解外,军事方面,我们的战略威慑优势是背靠巨型半岛大陆,借助岸基空军和导弹的掩护,处于内线作战的有利位置,外部海上松散之敌对联盟处于外线作战不利位置,我们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

强大海军的建立可改变对周边国家的战略态势。以对越南为例,自古以来都是从陆上山地强行进入其境,越北部崎岖山地,沿着细长的腹地延伸,后方补给困难重重,前进难以为继。而强大海军一旦在海上展开,地形上犹如丝瓜面对快刀,可在其细长之海岸线任意一点登陆,其北方与我云南、广西接壤的巨型“头部”地区立刻陷于陆上被合围的困境,从而改变千百年来传统中越军事态势,强大的中国海军将使越南在北部军事部署上进退失据、手足无措。这一“以海遏陆”地缘军事战略态势无疑会影响其战争与和平的外交选择。

此外,在东海方向,一旦台海有变,强大的海军可兜围台湾,并随时威胁日本南方诸岛,亦可游弋于太平洋心脏地带。在印度洋方向,除掩护我国“海上生命线”外,可从海陆夹击印度。如果中国海军具备这样的威慑能力,那是分化和挫败美国在亚太

拼凑遏制中国海上军事同盟最有效的军事手段,将使周边国家考虑依附美日海上军事同盟时,不得不有所顾虑。

上述海军战略威慑并非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也非认定未来与某些国家“必有一战”,而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必要的考虑,是和平外交必须的后盾,也是建立和谐海洋、和谐世界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和平事业的一部分。因为,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废武而求和平。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即使孔子推崇备至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和谐世界,也需“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来维护。对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决不可迂腐地以理想主义颠覆人类和平的历史规律。

本文主体部分发表于《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

目 录

第一章 太平洋海权角逐的传统与现实(1633—2013)	1
第一节 1633 年以来太平洋“话语权”的主角 ——海上军事力量	1
第二节 太平洋海权角逐的现实	4
第二章 日本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7
第一节 日本海权战略历史演变	18
第二节 当前新形势下日本海权战略	22
第三节 日本安全压力及其海上自卫队建设措施	26
第四节 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36
第三章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美国海军政策调整与展望	43
第一节 美国海军政策调整的影响因素	44
第二节 美国海军政策的调整	51
第三节 海军政策调整对海军的影响	56
第四节 美国海军政策调整对其亚洲战略的影响	65